

沧海遗珠的守护者

——陈其恩《石塘风情》读札

黄玉成/文

一把鲞刀从黄鱼的子门边落下，四十五度角入刀，沿背鳍划出一道弧线，行至鱼头时从头盖骨与右眼之间穿过——保住头壳完整，不让鱼脑中那两颗耳石掉出来。渔民管这一手叫“避珠”。

写下这段记载的是陈其恩——温岭松门白鲞加工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，也是《石塘风情》的作者。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，渔村无数，然而能够将一方渔区的风俗民情系统整理、形诸笔墨且留存于世的，却寥寥无几。《石塘风情》正是这样一部难得的著作：2006年11月，它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，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给出“写得好，有价值”的质朴评价。一位“画史通儒”对一部渔村风俗志作此评价，其间蕴含的文化眼光与乡土深情，颇值得细细品味。

陈其恩，1938年出生于温岭市石塘镇箬山一个世代从事渔业的家庭，从小受海洋文化熏陶，年轻时就读于山东大学水产系，一生从事水产工作，与渔村、渔业、渔民打交道。他意识到，若不及时记录这些散落在渔村角落的文化遗产，它们将会迅速消逝，永远沉入海底。于是，他从渔村的咸腥海风中走来，带着渔民后代的天然血脉去书写自己的故乡。

促成《石塘风情》问世的契机，是陈其恩应邀参与《温岭渔业志》的编撰工作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将自己所撰部分内容扩充改写，遂成此书。这一写作过程颇具象征意味：志书的严谨框架为他提供了骨架，他对渔村生活的血肉记忆则为这骨架赋予了生命的温度。在当代地方文化书写中，很少有一部书能够如此典型地体现“学者”与“土著”双重身份的融合。

翻开《石塘风情》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其内容的包罗万象。举凡石塘之民风习俗、方言俚语、服饰饮食、节庆传说、人文景观、渔业生产，均收笔底。

书中对“松门白鲞加工技艺”的记述尤为珍贵。陈其恩是这一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，1955年曾在全省水产加工会议上介绍该技艺。他笔下的剖鲞工艺精确到刀锋的每一次转折：“打开八字”如何落刀，“直刀”如何收尾，“避珠”如何让鱼脑中的两颗耳石不掉出来，皆有法度。这种精确而充满现场感的描述，若非亲身经历过渔行的劳作，断然写不出来。

2009年，“松门白鲞加工技艺”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，陈其恩的记述功不可没。

书中对渔家日常生活的记录同样细致入微。他将石塘特色小吃概括为“一龟一粽，两汤三面，三圆四粉，四羹五酒”——十六个字便勾勒出渔区饮食的基本谱系（“龟”即糖龟，一种米制的甜食）。渔民的服饰亦有描写：“渔民的服装布料，均用粗布染栲汁，因为栲过的布料耐海水腐蚀。式样一律是大襟左衽，因为站在船左舷摇橹作业，免使海水泼入内衣。下身穿拢裤，是因拢裤大裆大裤脚穿着方便，把上衣衣襟统统拢入裤内，免得在船上东挂西钩不安全。”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，恰恰是渔区生活逻辑最真实的呈现。

方言俚语的记录更是这部书的独门绝活。陈其恩对“渔行窃语”等渔区特殊语言现象的关注，显示了他对文化“活化石”的敏感。语言是文化的基因，当一种方言中的行业隐语消失时，与之相连的整个生活方式就会瓦解。陈其恩以文字为这些即将沉没的语言留下了锚点。

不过，记得全不是这部书最难得的地方。

当代民俗学面临的一个根本困境是：真正的民俗持有者往往不写作，而写作的民俗学家往往不在场。《石塘风情》的独特价值，在于陈其恩同时具备了“持有”与“写作”的能力。

海洋画家郭修琳生前的评价最为中肯：“除了陈其恩，其他人写不出。只有长期浸淫于渔村生活，热心渔家风俗的有心文化人，才能记录海洋民俗文化‘活化石’。”郭修琳是石塘人，却因长年外出学画，与家乡的许多风俗隔绝已久。他举过“搁灰”的例子：旧时的大钓渔船经秋季在港修整，打扮得漂漂亮亮、整整齐齐——渔区素有“正月头的女人，八月头的船”之说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便择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举行开渔典礼，通过母船、子船的运行检验渔工驾驶技能，最后在鞭炮声中结束。这个仪式，郭修琳一无所知，陈其恩却因亲历而烂熟于心，把它记进了书里。

渔家青年男女傍晚坐在船舷对渔歌的场景，令郭修琳感叹“犹如刘三姐对山歌”。他说，若非陈其恩的记录，这份海山民俗风情“真的就泯灭无存了”。这种“在场”的书写，使得《石塘风情》具有了一种志书难以企及的温度与质感。它不是冷冰冰的条目罗列，而是一个渔家子弟对故土记忆的深情打捞。

当然，这样的书也有它的边界。本土书写倚重个人记忆，少有学院派那套注疏与比较：石塘人多是闽南移民后裔，其风俗究竟如何流变，书中着墨不多；绳结方法、鱼鲞的加工规程，多是一家之言，缺少旁证与互校。然而恰恰是这种“不全面”，成就了它的不可替代——当人类学家需要依靠“报道人”来获取信息时，陈其恩就是最好的“报道人”；而报道人一旦提笔，那些琐碎的知识便都有了着落。

由此说来，《石塘风情》的价值，首先在于它是一部“抢救”之书，是“叙志记之所无，补史传之所缺”之书。在官方志书的宏大框架之下，渔行窃语、绳结方法、鱼鲞的加工规程这些“琐碎”的知识往往无处安身，而陈其恩恰恰在这些地方用力最深。

2012年，他推出《石塘风情》修订本，新增航运、造船、水产加工、海水制盐以及海洋剪纸等内容。此时，他已年逾古稀，却依然笔耕不辍，这种紧迫感令人动容。他深知，随着老一代渔民的老去，随着渔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，“石珠不落”的剖鲞技艺、“有风浪同挡”的渔家伦理等，都在不可逆转地消逝。

更深一层看，《石塘风情》代表的是一种被忽视的写作传统：有本土生活经验的知识人，以朴素的方式记录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。这种写作没有学院派的规范包装，却有着“父老口传”的真实与直接。

石塘被称为“文化飞地”，闽南移民后裔居多，民俗风情浓郁，积淀着闽南文化的印痕。陈其恩已于2021年辞世，但他记下的那些刀法、口诀与渔歌，替这片“飞地”留下了一份完整的文化档案。

咸是玩笑的底色

——读刘震云《咸的玩笑》

朱宜尧/文

杜太白最后沦落到在城门口卖萝卜。此前他是中学老师，此后他再没回到讲台上。刘震云把这个人的半生写进新长篇《咸的玩笑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），书名里那个“咸”字，是眼泪的味道。

书里处处是玩笑，看似轻松诙谐，细品却带着咸涩的锋芒，像作家撒下的一把“盐花”，落在人身上，隐隐地疼。

名字是玩笑吗？是。

作家给小说主要人物取名为“杜太白”。李白，字太白；杜甫，字子美。两个人的名字，合成了一个，小说人物诞生了。还有杜太白的儿子叫巴黎，女儿叫纽约，这两个名字按照“杜太白”的话说绝对“国际化”。仔细琢磨一下，杜太白去不了巴黎、纽约，就让巴黎、纽约来到身边。这还不算完，侄子的名字也是他起的，叫伦敦。他把远方的繁华、喧嚣、斑斓、自由、辽阔都寄托在孩子的名字里。当然，有寄托不是不好，而是这种寄托近乎“戏谑”“荒诞”。在笑过之后，是痛定思痛的反思。那么，我们的思维可以延伸，这样理解作家笔下的人物——杜太白，完全有可能他的名字本不叫杜太白，而另有其名，是后来自己有了学问，成为延津最有文化的人物之后，改成“杜太白”的。

故事是玩笑吗？是，而且是三次。杜太白原本是中学老师，因为一场风波丢了教职；之后他改行做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，给人操办婚丧嫁娶；再后来连这份营生也难以为继，他流落街头，成了一个卖萝卜的小贩。刘震云的说法是，他从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又变成了第三个人。三次跌落，一次比一次低，每一次都来得突然，每一次都像有人在背后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

有意思的是，小说的结构也是一种“玩笑”。小说分为三个部分：正文一，题外话，正文二。正文一讲鸡鸣寺僧人智明的往事，是一个故事，也可以看作一个寓言。正文二回到泰安一家叫“知味社”的小饭馆，是生活，也是小说的灵感来源。在以往的认知里该作为主干的“正文”，加起来不过薄薄一册。作家说的“题外话”，写的才是杜太白的沉浮跌宕，才是真正的小说“正文”。正文与题外话的错位，印证了我们的生活：正题是题外，题外是正题。这是一种只可意会，不可言说的隐喻。我们就是在这种错位中，理清生活，看清自己，保有热爱，持续努力，接纳琐碎与庸常。

作家借这本书说了两个词：一个叫“死扣”，一个叫“活扣”。当你身处困境，有人给你系的是死扣，越挣越紧；有人系的是活扣，留出喘息和解开的余地。杜太白遭逢风波时，千万人围看的热闹里无人倾听，那是死扣；而他后来自己解开了困局。小说最后，他的眼泪流到嘴里，他咂摸出——泪是咸的。书名到这里才合上：世上有许多玩笑，注定要流着泪开完。

合上书，最难忘的还是杜太白给孩子起的那些名字：巴黎、纽约、伦敦。他一辈子没去成那些地方，却把远方安放进下一代的名字里，把严肃的寄托变成了可以调侃的玩笑。玩笑开到最后，他给自己留下的，就是这几个名字。

夏洛特的小屋

——读简·奥斯汀《傲慢与偏见》

点点/文

重读《傲慢与偏见》，我停在夏洛特在柯林斯家那间重新摆过家具的小屋里，停了很久。

年轻的时候读这本书，我最烦的是柯林斯。这个人自负、不知分寸，开口就是蠢话。夏洛特嫁给他，我觉得可惜。伊丽莎白替她惋惜时，我跟她一起惋惜。

后来再读，不这么想了。

书写的是英国乡下几户人家的婚嫁琐事，可读着读着，人心里那点小算盘、小面子、小固执就全露出来了。

班纳特家有五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按当时的法律，家产要由远房表侄柯林斯继承。这意味着班纳特太太和五个女儿，在班纳特先生死后，很可能被扫地出门。这是当时很多未婚女性的处境。

夏洛特当时二十七岁了。在那个年代，这个年纪嫁不出去，差不多就算老姑娘了。她长得也一般，家里没给她留下什么财产。她嫁给柯林斯，不是她看不出这个人有多平庸。她心里明白，自己没多少挑选的余地。伊丽莎白可以等达西，夏洛特等不起。她要的是后半生的安稳。在她能选的范围内，安稳比爱情更实在。她订婚之后私下和伊丽莎白说：我不是个浪漫的人，我只要一个舒适的家。

奥斯汀1817年在给侄女的一封信里写道：“未婚女性有可怕的贫穷倾向，这是结婚的有力论据。”她说这话不是劝人随便嫁，但她太清楚夏洛特面对的是什么了。

伊丽莎白替夏洛特惋惜的时候，是真心的。但那份惋惜里，有多少是替夏洛特想，有多少是拿自己的处境去衡量她，伊丽莎白自己大概也没分清。她觉得那是妥协，是委屈。

我滑过去很多年。直到有一次重读，读到伊丽莎白去肯特郡看望新婚的夏洛特。她走进那栋房子，看见夏洛特把家具重新摆过，把一间屋子布置成自己的小天地，避开柯林斯。伊丽莎白心里替夏洛特难受。她觉得这个朋友算是完了。

问题在于，奥斯汀写这两条线用的是同一种写法，效果却不一样。她写达西那条线，让我们跟着伊丽莎白的眼睛往前走。伊丽莎白信威克姆，我们也信；她觉得达西可恨，我们也觉得可恨。然后，奥斯汀把那封信往读者面前一放，真相一个一个推出来，读者跟伊丽莎白一起傻眼。写夏洛特这条线，她写得太轻，轻到很多读者会跟着伊丽莎白一起滑过去。

伊丽莎白没看错。夏洛特确实不爱柯林斯，柯林斯也确实是个蠢人。这门婚姻里没有爱情、理解、精神上的陪伴。伊丽莎白看到的“不幸福”，是真的。

但伊丽莎白漏掉了一件事：夏洛特手里没有伊丽莎白那些牌——年轻、伶俐、父亲还在。她如果嫁不好或者嫁不出，后半辈子很可能寄人篱下。柯林斯蠢，可柯林斯有房子，有收入，有一份体面的牧师职位。她打出的这张牌，是手里最安全又不太烂的那一张。

张爱玲写的白流苏，也是这么一个等不起的女人。二十八岁，离了婚，娘家容不下她。张爱玲后来说过，白流苏原该不止三十岁，怕读者不接受，才改成二十八岁。她跟范柳原周旋，图的不是爱情，是后半辈子的着落。白流苏嫁了范柳原之后，张爱玲只写了一句：他不再跟她说笑，把俏皮话说给别的女人听。名分有了，玩笑没了，白流苏有些失落。张爱玲不替她哭。奥斯汀写夏洛特，用的也是这样的笔法，不替她哭，也不替她辩解。只是伊丽莎白在旁边说了可惜，我们就跟着她觉得夏洛特可惜了。

这种选择，现在也见得着。杨本芬写《我本芬芳》，把自己写成惠才，写她和丈夫吕医生六十年的婚姻。吕医生在外人眼里是标准的好男人：老实本分，不烟不酒，不出轨，不家暴，工作稳定，养家糊口。可回到家里，他关上了所有的门。惠才养的一只鸡丢了，他认定是她卖了贴补娘家，整整三个月不跟她说一句话。晚年，她问他：下辈子还愿意一起过吗？他答得干脆：不愿意。吕医生没做错什么大事，家庭责任他都尽到了。杨本芬说，她六十年里始终是一个人过日子。

夏洛特和吕医生，隔着一百多年、隔着一个欧亚大陆，坐在同一种屋子里。屋子不漏雨，锅里有饭，身边有人，但那个人不问你今天开不开心，不问你怕不怕，不问你一个人在家闷不闷。说话也仅限于过日子必须说的话。伊丽莎白走进夏洛特那间屋子，没看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。夏洛特也知道这间屋子里缺什么。但是，她只能先要一间屋子。

书里还有一个人，什么都看透了却什么都不做——伊丽莎白的父亲班纳特先生。他把家里的事看得清清楚楚，妻子的肤浅，女儿们的天真，财产继承的残酷，他全明白。可他选择冷眼旁观，还经常用聪明和嘲讽把自己摘出去。直到莉迪亚跟人私奔，出了丑，要连累到全家人的名声，他才匆匆忙忙去补救，显得无力和被动。夏洛特同样明白自己的处境，而她是挪了步的——用婚姻换一间能自己摆家具的屋子。伊丽莎白读信之后认了错，改了看法，也改了做法。这是她比父亲强的地方。但在夏洛特这件事上，她连“自己可能错了”的念头几乎都没起过。她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远远望了一眼夏洛特的日子，说了声“可惜”，就走了。

达西也不是一开始就对的。舞会上他没把伊丽莎白放在眼里，后来自己承认，从小家里教他规矩，也纵着他，他慢慢就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。被拒婚后，他才开始回头看自己。

奥斯汀写的不是一段姻缘怎样修成正果，而是人怎样从自己那点小天地里，慢慢走出来。她让伊丽莎白和达西幸福地结了婚。至于夏洛特，读者合上书，大概就忘了。

可夏洛特那条线，奥斯汀留了一道缝。她写夏洛特在柯林斯家里给自己划出一块地方，写夏洛特把日子过下去了，写得不动声色。她不多写一个字。

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故事收得很圆满。合上书后，我脑子里留下的，还是夏洛特那间重新摆过家具的屋子——屋子不大，是她用自己手里那点余地，一尺一寸挪出来的。

地址：横湖中路161号 邮编：317500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温市监广发3310078号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单位：台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：椒江区纬一路98号 中国邮政温岭分公司发行 投递、投诉热线：86142666 打击虚假新闻举报电话：86144005 值班编委 张洋